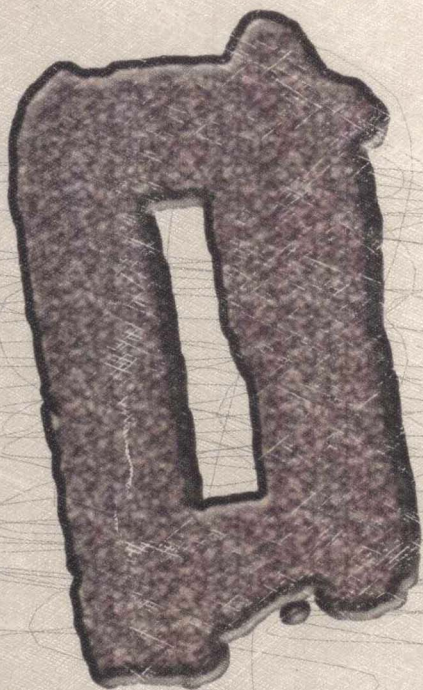


THE ECONOMICS OF THE REAL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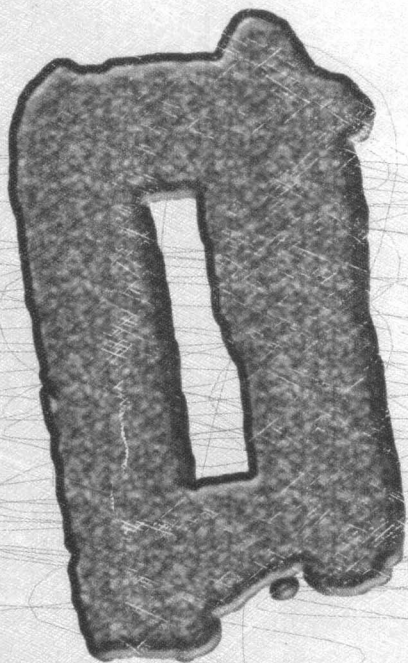


真世界的
实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THE ECONOMICS OF THE REAL WORLD



真世界的
实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著.—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1(2004.4修订)

ISBN 7-80087-535-0

I.真… II.周… III.经济学-随笔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6054号

书 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著 者:周其仁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7-80087-535-0/F·357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开 本:1/32 880×1230mm

印 张:10.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04年4月第2版

印 次: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咨询电话:(010)68990692 68990682

网 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代序：猎人的风采（张五常）	（ 1 ）
作者序言	（ 5 ）

一、人力资本的产权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19）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29）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	（36）
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	（45）
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	（49）

二、研究企业家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59）
-------------------	------

新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68)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是一样的	(77)
信誉与运气	(82)
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	(86)
驾驭不确定性	(91)
企业家能力竞争的舞台	(96)
普通人投资的世纪	(106)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113)
入世与中国企业价值的重估	(123)

三、公有企业改制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	(135)
自然人持股：绕不开的话题	(152)
企业改制，何谓成功	(157)
国有企业：不能不谈“方丈”只说“庙”	(159)
“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165)
攫取与公有制企业改革	(179)

四、市场的守夜人

守夜人的经济学说	(199)
另一条印度道路	(203)

启动经济和政府退出	(210)
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	(223)
哈尔滨不相信眼泪	(231)
转型期城市就业也需“软着陆”	(238)
要反对的不是重复建设	(246)
高科技永远都很“高”	(250)
邮政专营的三个理由	(259)
市场间竞争与股市规范	(263)
自发的梧桐树	(274)

五、农民问题

大陆农民的稳定还能持续下去吗	(283)
村庄与粮价	(297)
高经济增长与农业发展	(309)
农村就业：转折与转机	(317)
又见粮改	(323)

代序：猎人的风采

张五常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身兼两职，飞来飞去，也是浙江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52岁了，他的出身与我的大有雷同之处，而大家对经济研究的兴趣更为相近。

1966年在上海初中毕业，跟着遇到文化大革命，没有读高中（我也没有），68年下乡劳动10年，其中7年半是打猎生涯（我钓鱼7年半，雷同也）。打猎也是农业，但比种植或饲养远为刺激精彩。其仁打猎，每天在荒山野岭奔走50公里（我是坐着下钓的），有期望，锻炼了耐性，磨砺了好奇心。

1978年，28岁，其仁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我进大学是23岁），82年本科毕业，之后用了7年时间参加农业研究与中央改革政策研究。1989年到美国去，学了9个月英文，90年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一年，然后转到我的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博士，96年到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在洛杉矶攻读时，他曾任驾驶司机，这与1958年我在多伦多作过计程车司机类同。

周其仁今天教的是他读初中及打猎时我参与发明的新制度

经济学，而他的研究是以实地调查为主，兴趣与取向皆与我不谋而合。钓者负鱼，猎者负兽，难道其仁和我都为着欠了些什么而选走真实世界的路？

作中国经济的实地调查，其仁和我同步起于1982年。但我大部分时间身在香港，除了一年几次到大陆巡视，一般是远看庐山，或邀请在北京搞经改的朋友到香港来倾谈一下，而香港商人到大陆投资的经验，时有所闻，每天都在变。是的，当年我是以置身事外的观察而写成《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等书。

周其仁呢？他身在庐山，调查研究是落手落脚的那一种。我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是近看小桥流水、花草竹石。我宏观，他微观。重要的是，我们的宏观与微观合并起来，没有不吻合之处。

20多年来中国开放改革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绝对仅有的宝贵经验。钓者与猎者遇上，当然见猎心喜。是时也命也运也，我们掌握着的经济学知识，是有关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以笔为竿，一个以笔为划，写下了不少将来的经济历史学者不会忽略的随笔小文章。

都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下笔的，只是一个不知小节，论大势，另一个小节知得多，分行业处理。

我当然推荐周其仁这本《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的真实世界》。不是茶余饭后，或电视广告时间，你要翻阅的书。要不然不读，要读就坐下来细读。记着，要把电视机关上了。不是娱乐读物，有些地方有趣，有些地方沉闷。但只要你能细读，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对中国各行各业的情况知得很

多，很深入。不是在报章或一般刊物可以学得的。作者亲历其境，实地调查，有分析与观察力，然后忠实地以他的见解报道出来。

中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授是个猎人，文笔流畅，潇洒豪爽，不滞于物，大有猎人的风采。

（本文是张五常教授为本书香港版所写的序言）

2003年4月

作者序言

本书收集的，大部分是我 1995 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章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论文与头衔

回来之前，我正在 UCLA 要结束博士论文。一般的程序，是先过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就去找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经过一个国内叫作“开题报告”的门槛，开始论文写作；论文写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场论文指导委员会的“答辩”，就可以办手续取得博士头衔。但是，我所在的那个项目——我的论文方向是经济史，由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组成委员会——比较特别。这个项目博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是合并在一起的。就是说，在导师同意开题之前，你论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离十。答辩一通过，学生只需把经过最后润饰的论文分头给委员会成员签字，再也不要上“堂会”去“保卫”自己的论文了。

我很幸运，答辩一次过关。老师们很高兴，书面写下的意见无非肯定我的论文“有极大的潜力”。我也很高兴，因为自

已选的论文题目，连同提出的问题、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新的假说以及准备的资料 and 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认可“够博士资格”。屈指算来，那时距我进入 UCLA 的博士项目不到四年。

有两位在英文上帮了我大忙的美国同学，知道我于 1989 年“计划外”进入美国的时候还“目不识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进了美国才开始正式学英语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如诗如画的科罗拉多州的布德镇学了九个月的英文；第二年，经 Gale Johnson 教授推荐，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三年，就进入 UCLA。就算一个念书的天才，这样“走”的也不算慢吧？何况我对自己考察了多年，结论是智商平平，与天才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这里面的“经验”，我将来在论文的中文版面市时，要向读者交代。

但是，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后来却“搁浅”了，一直要等到 2000 年夏天我再次回到 UCLA 才办完全部手续。本来到 1995 年底，我论文的主体章节，就已经分别写过两、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章能够将全文贯串起来的“导论”和一章“结论”了。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 1996 年暑期前结束全部论文，秋高气爽时节就打道回府。按照过去的进度，这并不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论文在答辩通过后还搁置五年之久呢？

到北大任教

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

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 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像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 James Lee 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离土”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的实地调查，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接“地气”：水工研究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80年代我跟了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抵近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于是，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上世纪四十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我们可是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工夫，“盲拳可以打倒

老师傅”。

在本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作为一个“电信经济问题专家”——我是1998年秋“卷入”电信开放市场的论战的，大部分有关文章已经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数网竞争》一书——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全部来自于“水工”。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本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接“地气”：企业调查

其他有三个栏目与企业和企业家的题材有关。那是我回国之后第二档经济调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结果。说起来，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80年代参加农村调查，最后得出为数不多的理论性结论之一，是农民的经济出路——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在组织形式上，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当时认识到，在我国的国情传统里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靠行政等级维系的组织很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很发达，唯独靠自由契约的市场组织不发达。自那时起，“公司”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工夫。他那篇

大学三年级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就的“论企业性质”的大文，我读之再三，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后来UCLA听Demsetz教授的课，重点也是企业理论。1996年，我将那些个读书笔记整理出了一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市场里的企业”理解成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此篇笔记——连同其他回国后写成的其他一些学术性论文，已经交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其实是我为要开展的企业调查准备的“家庭功课”。

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真实企业”的机会。第一家考察的公司，是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我现在还记得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当时听来令我感到吃惊的数据：平均每三个生产工人就有两名市场营销人员。我想年轻的科斯实在了得，用“市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几十年后中国一家他从未谋面的公司的特征！

走进第二家公司的大门，应该是1997年。那是上海的“远东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市场订单，已经陷于破产的边缘。当时上海纺织工业的形势动人心魄：全行业55万工人已经下岗28万。我和周放生——他当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对国有企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走进当时还在外滩的纺织工业局大楼去访问朱况宇局长的时候，左边四个大字是“无情调整”，右边四个大字为“有情操作”。朱况宇对国有公司的体制病有入木三分的见地，他的谈话，概括起来也是四个字：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战出了大名堂。原来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到远东厂“扭亏增盈”的工作组组长吴玲玲，主持了两年人事，知道